

# “不科举之科举”

## ——清末浙江优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

张 仲 民

**摘 要：**清廷立停科举后，保留了优拔考试作为善后之策。按照设计，浙江在提学使支恒荣主持下，先后于丙午年（1906）举办了优贡考试、己酉年（1909）举行了优拔考试。这两科考试吸引了大量具有新式身份的考生参加，造成很多弊病，更引发科举复归的争议，遭致时人与时论的诸多批评。当时认为续行的优拔考试实际是“不科举之科举”，起到了强化时人的功名意识与科举崇拜的作用。因此，讨论废除科举制的社会效果与后续影响等问题，有必要从制度史与社会史结合的层面，将优拔考试等清廷采取的后续补救措施所起的作用考虑在内，并注意从历史记忆塑造的角度，结合其时与考优拔诸人的言行、学部与提学使的具体作为，来重新检视传媒、当事者及清亡后时人的后设反思，乃至后世研究者的研究于再现和重构清末科举停废一事中存在的差异与盲区。

**关键词：**优拔考试 支恒荣 提学使 学部 趋新媒体

### 导 言

1907年3月6日，上海《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杭州卖书记》的文章，该文系一位原籍浙江宁波的上海书商“四明语生”对他在杭州优贡考市卖书情况的记录。从内容上看，作者明显希望在卖书赚钱之余，传播新学进行启蒙，结果却让他非常失望：趋新的他发现参加此次考优的众多浙江士子热心功名之切；而对于新学之了解，一如科举未废除时那样程度“卑下”，不读新书，没有一般常识，“思想之鄙陋有不能言语形容者”。因此，该书商目之为“二十世纪中国之怪现状”，“不禁为吾浙前途悲”。<sup>①</sup>这里让“四明语生”极度贬斥的优贡考试，即系清廷立停科举后保留的善后举措——“十年三科”之第一科丙午考优。

1905年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清廷正式下旨停废科举，“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要求各地“多建学堂，普及教育”。<sup>②</sup>为防止

<sup>①</sup> 四明语生：《杭州卖书记》，《时报》1907年3月6日，第5页。

<sup>②</sup>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内阁奉（5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册，第115页。该上谕又见《电传上谕》，《申报》1905年9月6日，第1张第2版。

士子受到的震荡太大,谕旨根据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七人在联衔会奏中所提的建议,没有停止此前辅助性的“考试优拔”等举措,反而将此作为善后之策,以便为之前举、贡、生员等所谓“旧学应举之寒儒”的未来出路留下保障:“拟请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皆仍于旧学生员中考取。其已入学堂者,照章不准应考。惟优贡之额过少,拟请按省分之大小酌量增加,分别录取,朝考后用为京官、知县等项。三科后即行请旨停止。”<sup>①</sup>前述之浙江丙午考优一事即发生在此背景下。

鉴于丙午优贡考试系清廷废除科举后首次举办,较之山东、福建、云南、河南、吉林等省提学使操办优贡考试的情况,浙江提学使支恒荣尤其积极,使得文风昌盛的浙省优贡考试,以及两年多后的浙省己酉优拔考试,颇为时人关注,也广受上海的趋新媒体乃至全国媒体之注意,留存下来的相关资料较多(其他省份则相对较少),典型性突出。此个案有助于我们认识科举废止后续行的优拔等考试如何承担了昔日乡会试的作用、在地士子对于科举停废的反应和对旧时科举制度的惯性依赖情况,以及学部与提学使乃至趋新媒体在其中所扮演的尴尬角色,进而可让我们从制度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层面,重新检视科举停废后造成的社会影响究竟为何等重要问题。<sup>②</sup>以下就先从掌管全国教育权力的学部奏请任命各省提学使说起,因为正是这些提学使在代表学部负责筹办各省的优拔考试事务和其他文教事业。

## 一、提学使人选

1906年5月中旬(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为适应科举停废后“专办学堂”的需要,清廷正式裁撤学政,在各直省新设提学使司提学使一职,其职责为“统辖全省学务,归督抚节制”,<sup>③</sup>原则上任职人选“多拟由翰林院人员品端学粹、通达事理,及曾经出洋确有心得,并京外究心学务、素有阅历之员”。<sup>④</sup>随后,学部迅速“简放”了22位提学使。<sup>⑤</sup>提学使地位虽不如旧日学政,<sup>⑥</sup>

① 《直隶袁会同盛京将军赵、鄂督张、署江督周、署粤督岑、湘抚端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山东官报》第16号,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第1—3页。该折当时曾被各报广为转载,收入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87《选举考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引文在第8456页。

② 学界对于清廷废科举后的补救举措——优拔考试的研究非常少。除商衍鎏外,关晓红教授依据《神州日报》等清末报刊有过一些基本讨论,徐跃教授对此有少许补充,还有个别学者曾略有涉及,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7—40、193—194页等;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71—194页;徐跃:《晚清优拔贡考试与山东巡抚袁树勋联衔入奏——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补正》,《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等等。

③ 《政务处、学部会奏遵议裁撤学政,请设直省提学使司一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学部官报》第1期,第2页。

④ 《谨拟各省学务详细官制及办事权限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学部官报》第2期,第22页。

⑤ 《学部奏请简放提学使司、提学使一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学部官报》第1期,第2页;《电传上谕》,《申报》1906年5月14日,第1张第1版。

⑥ 时论后来曾有简单区分:“从前之提学与督抚并行,而今则受属于督抚;从前之提学,一切供张由各州县办差,而今则皆自办;从前之提学,出棚考试之时,承差之吆喝、门役之嘈嘈,排场极阔,而今则终日坐冷署中。此皆各省提学使郁郁不得已之事也。”(《提学使之恐慌》,《申报》1909年8月26日,第2张第4版)

作用却颇为相似：<sup>①</sup>也掌管一省的文教事务，对于新办学堂事业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sup>②</sup>一度被时人与时论寄予厚望，“士民喁喁待命”，期盼“地方学务可孟晋矣”。<sup>③</sup>武昌县的士子朱峙三通过阅读《汉口中西报》知道清廷将学政一律改为提学使的消息后，在日记中评论道：“科举去年明令停废，自是以后各县专办学堂，以为培植人才之地，可望吾国富强矣。”<sup>④</sup>然而之后多数提学使任上的实际表现却同此期待大相径庭，多省提学使上任后，所用下属与昔日之学务处和学政无异，名新实旧，换汤不换药，“提学司委用之人员即学务处人员也，提学司任用之书办，即学务处书办也”，“今日之学司，一旧日之学使也。所委权者惟幕友，幕友非门生即故旧，承意旨仰调剂者也。”<sup>⑤</sup>无怪乎此后时论谓：“言兴学则提学使顽固者居大多数。”<sup>⑥</sup>

其中，江苏丹徒人支恒荣（1848—1914）被任命为浙江提学使。支系丁丑年（1877）二甲第15名进士，举进士虽早，宦途却颇为坎坷，只担任过翰林院侍讲学士、湖南学政等职，任上表现偏于守旧，故引发时论高度关注。像《中华报》上有评论专门针对支恒荣，认为新简放的各省提学使，“大半为学界著名之人，舆论翕然，于各省学界之前途裨益良非浅鲜”；只有浙江提学使支恒荣，“向以守旧著名，其在湖南学政任时，专与新学为仇，以保存书院为唯一之目的，致湘省学界如春花蓓蕾骤遭霜雪，忽尔颓萎，无复生机。”进而还担心新学正在萌芽中的浙江学界会遭支恒荣摧残，“不得不为全浙后学吁恳学部诸公亟加援手也。”<sup>⑦</sup>《时报》则直接说这批提学使人选由学部尚书荣庆决定，因支恒荣是“荣相之师”，故虽属“著名顽固”亦获选。<sup>⑧</sup>

时论关注之外，身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对各提学使人选也有评论。如与荣庆交好却未曾得到提学使实缺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即颇有异议，认为系“循资格用人”，有“植党”之嫌：“今日简用二十二省提学使司提学使，盖学部开单而用之，共（疑当为‘其’——引者注）所援引多有出人意计外者。”<sup>⑨</sup>同恽毓鼎一样不满的还有当政的湖南籍军机大臣瞿鸿禨。瞿鸿禨曾想插手提学使任命，却未能如愿；鉴于支恒荣之前在自己家乡湖南任上的表现，他对学部委派支恒荣（继卿）为浙江提学使尤感不满，特意致信同乡密友户部尚书张百熙抱怨道：“继卿莅浙，更失人望，言之不听，吾末如何。缺单呈阅，恐无异于从前学差也。”甫离管学大臣职位的张百

① 提学使在直省地位是督抚之下仅次于布政使，高于按察使，即所谓的藩、学、臬次序。关于提学使的地位和权责，参见《奏定提学使之秩序》，《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12号（无出版时间），“时闻”，第2页；《谨拟各省学务详细官制及办事权限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学部官报》第2期，第22—28页；《续拟提学使权限章程折》，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学部官报》第3期，第47—49页。

② 此后学部又规定：“自提学使到任后，凡现当各学堂管理员均须报由提学使考核，以后如有撤换，悉由提学使札派以专责成”。（《学部咨访学堂管理员悉归提学使札派》，《时报》1906年11月26日，第3页）

③ 《浙江提学司之舆论》，《中外日报》1907年1月29日，第8版。

④ 胡香生辑录：《朱峙三日记（1893—1919）》，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9页。

⑤ 《浙江提学司之舆论》，《中外日报》1907年1月29日，第8版。

⑥ 《敬告当道者》，《中外日报》1907年3月3日，广告论前第2版。

⑦ 《提学使之舆论》，《中华报》第504册，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第8页。

⑧ 《追述新简提学使事》，《时报》1906年5月28日，第3页。

⑨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9页。

熙对此表示赞同：“手谕、缺单并领悉。约八九省尚称得人，余则不可知矣，宜公有末如何之叹也。”<sup>①</sup> 支恒荣之不孚人望的另一个表现是关于他的任命一发表，即有御史弹劾“谓其不胜提学之任”。<sup>②</sup>

浙江一些地方趋新精英也很快做出反应。如认支恒荣为老师的温州名士孙诒让即对这一任命非常不满。他在得到湖南学界集体向学部致电抵制吴庆坻任湖南提学使的消息后，致信友人刘绍宽，表示期待浙省学界能效法湘省有所动作，因支恒荣风评“尚不及吴，何以待之。想省中诸贤，或有举动矣”。<sup>③</sup> 但浙江后来并未发生公开抵制支恒荣任职事件，让颇思在学务上有大作为的孙诒让很是失望。支恒荣上任后，委任孙诒让出任浙江学务议绅职务，以更好发挥其办学长材，但孙诒让最初根本不愿接受支恒荣的任命，以健康欠佳婉辞，并推荐蔡元培等人代己。在接连收到支恒荣三封信后无法再推辞，以学生身份自认的孙不得不“勉遵台旨”，旋即又打算辞职，并辞谢了支恒荣的其他任职邀请。<sup>④</sup> 另一趋新浙人汪希曾亦曾于丙午年十二月初四日致函在北京办报的浙省名流汪康年，表达对浙省学务现状的担忧，认为支恒荣到任后的用人不当、兼又忙于准备举办考试，更恶化了内中情形：“故乡亦无起色，学务一落千丈，断难挽回。支到日日忙考，重以所携非人，则不惟无起色，犹虑有江河日下之概。都中同乡诸先生僥亦闻之欤？”<sup>⑤</sup> 得到汪康年回信安慰后，汪希曾仍悲观感慨道：“浙省学务，萎靡如昔。支老持退守主义，又无贤者辅佐之，一落千丈，又须迟三年才得翻身，何浙之不幸也！”<sup>⑥</sup>

与这些对支恒荣的负面评价相反，清廷收到的密报则对支恒荣湖南学政任上的作为评价很高，主要是对其考试各属生童时的表现，说支氏“随时密加察访，考试谨严，宗旨端正，士论允惬。兹届年终，谨据实密陈”。<sup>⑦</sup>

值得玩味的是，当时学部简放的22位提学使，除浙江提学使支恒荣、湖北提学使黄绍箕、福建提学使姚文倬、广东提学使于式枚等8人为实授外，其余均为署理身份。<sup>⑧</sup> 到宣统元年（1909）夏，以署理名义任职者一度曾多达提学使总数的三分之二。不管是实授或是署理，除了像支恒荣、姚文倬、孔祥霖、陈伯陶等少数人能任满三年外，其余提学使多调动频繁、任期短暂。如时论所言，这种情况很容易让各提学使在任内得过且过、推诿塞责或胡乱作为，“而署缺不过暂摄，恐于学务有敷衍。目前之弊，且怀观望以待实缺者之意。”<sup>⑨</sup> 对此情况，清廷高层也

① 黄薇整理：《张百熙、瞿鸿禨往来书札（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0、79条，第105页。整理者没有对信札进行系年，故排列次序混乱。

② 《侍御奏参支恒荣》，《大公报》1906年5月24日，第2版。

③ 《孙诒让致刘绍宽（十九）》，谢作拳、陈伟欢编注：《瑞安孙家往来信札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2页。

④ 《孙诒让致支恒荣书信三通》，谢作拳、陈伟欢编注：《瑞安孙家往来信札集》，第161—164页。

⑤ 《汪希曾函一》，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05页。

⑥ 《汪希曾函二》，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1106页。

⑦ 《奏为密陈湖北学政李家驹、湖南学政支恒荣年终考语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附片，04—01—13—0444—008。

⑧ 有关清廷任命提学使的具体情况，可参见《上谕》，《大公报》1906年5月1日，原报未注明版面。

⑨ 《提学使宜授实缺》，《顺天时报》1909年10月22日，第7版。

有所察觉，并试图让学部通过“甄别”提学使的办法去改变，但效果不佳（详后），此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清亡。

在各提学使正式就职前，学部先用两个月时间培训有关新式教育的内容，然后派支恒荣及其他12位提学使经由上海赴日本考察三个月，“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sup>①</sup>此段在日本的经历对支恒荣当有不少触动，其后支恒荣所上学务条陈即照搬了不少日本经验。

1906年11月底，支恒荣回国后即赴杭州。<sup>②</sup>拜见浙抚后开始履职，“分诣高等学堂、中学堂察阅一切，并须分赴各学堂考察课程。”<sup>③</sup>面对仙居县安洲学堂因“无款”而导致“全堂解散”的事件，支恒荣将表现不佳来杭自辩的堂长王炳焯训斥后撤职，连带对“扰民”导致该学堂散学的该县朱令“记过”，认为其“漠无心肝，视学界如弁髦”，另委堂长，同时另找经费补助该校。<sup>④</sup>当处州府有人抵制师范学堂时，支恒荣支持趋新者的禀请，认为应该急办师范学堂，不能让已经筹措的款项为人把持滥用。<sup>⑤</sup>《南方报》还报道了支恒荣支持杭州女校改为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的做法，其中说及支认为改办意义重大，愿意为该校向浙抚申请常年经费。<sup>⑥</sup>时论还关注到支恒荣根据学部要求将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行事“颇有次序”，并能积极履行职责，以及他特意禀请浙江巡抚张曾敷，希望能任命孙诒让及张美翊、吴震春、邵章四绅士为“学务议长（当为议绅——引者注），俾可随时商榷，以期尽善”。<sup>⑦</sup>最后，学务议长一职由浙抚任命退休官员钱塘人濮子潼（紫泉）担任，<sup>⑧</sup>而非原来杭州士绅极力推荐的汤寿潜，<sup>⑨</sup>孙诒让与张美翊、邵章和吴震春四人则充当学务议绅。<sup>⑩</sup>这也埋下了之后支恒荣与杭州地方士绅主导的学务公所产生冲突的种子。

为办好浙江学务，支恒荣还专门上条陈给浙江巡抚张曾敷，《时报》分三日连载了其内容。<sup>⑪</sup>该条陈提出9条办好浙江教育的意见：“广筹的款”，“严定赏罚”，“限定时日”，“造就绅耆”，“甄别出洋学生”，“注重小学”，“设立师范小学”，“设立女子师范”，“多设半日学堂”。从内容上看，支恒荣赞成普及教育及筹备立宪，认同兴学为急务，但他取法的主要系他考察所得或想象中的日本普通教育经验，导致其陈述过于高调、空洞，且乏新意，有生搬

① 《附奏提学使司人员先派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片》，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学部官报》第3期，第40页。

② 据报道：支正式上任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中旬（1906年11月30日），“定于月望受事，先行承接学务处关防。”（《提学使承接关防》，《南方报》1906年12月1日，第2页新闻）

③ 《提学使察阅学堂》，《时报》1906年11月26日，第3页；《提学使受事》，《时报》1906年12月2日，第3页。

④ 《训斥官绅敷衍学务》，《时报》1906年12月28日，第3页；《县令与学堂之冲突》，《时报》1907年1月3日，第3页。

⑤ 《提学司批松阳留学生叶葆科等禀》，《南方报》1906年12月28日，第2页新闻。

⑥ 《改办女校之批词》，《南方报》1907年3月4日，第3页新闻。

⑦ 《拟聘学务议长》，《时报》1906年12月27日，第3页。

⑧ 《浙抚选举议长》，《新闻报》1906年12月29日，第2张。

⑨ 《吴震春等为请委汤寿潜任浙江学务公所议长事禀笈帅文（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张曾敷档案十》，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1辑第98种，第566—568页。

⑩ 参见孙诒让：《与省学务公所议绅书》，张宪文辑：《孙诒让遗文辑存》，《温州文史资料》第5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5—146页。

⑪ 《浙江支学司上张抚条陈学务禀》，《时报》1907年1月28、29、30日，均在第4页。

硬套与纸上谈兵的嫌疑，并未顾及浙省财政困难的现实，以及中日两国不同的“国情”。因此，该条陈刊出后，马上有读者投书《时报》进行反驳，指出其中援引错误、不切实际及窒碍难行之处，乃至存在的对日本教育误解、曲解情况，最后还挖苦代支恒荣捉刀此条陈的幕僚水准“皆下驷”。<sup>①</sup>

支恒荣还在“省垣绅士公举”的情况下，委任“海宁之王绅国维”为浙江省“视学员”，以遵照执行学部“应派绅董为省视学”的章程。<sup>②</sup>但守父丧在家的王国维意识到当时局面难有作为，又想专研学术，并打算外出谋差，所以不愿就职。<sup>③</sup>

类似言论与举措表明，赴日本考察学务归来的支恒荣并非如此前传言中的那样“顽固”，他于浙江任上的作为完全不算守旧，更没有蓄意以新学为敌。上述诸报道中所呈现的支恒荣形象，其实颇为开明勤政、雷厉风行，且很具新闻效应，甚至连浙江巡抚张曾敦奏请为支恒荣每年加薪130两的消息，《新闻报》也会加以报导。<sup>④</sup>

## 二、丙午考优争议

在任内初期，支恒荣极力推动的，也可能是最为损害其形象之事，当属他以昔日办理乡试的方式办理丙午浙省考优事宜。此次考试结束后，支恒荣成为众矢之的，不但招致浙江士绅、士子的不满，还遭受上海三大报纸《中外日报》、《时报》、《新闻报》的同声谴责，批评支玩忽职守、贪财好利、思想守旧。

在时论看来，最初发放考优通知时，支恒荣就出现失误，没有强调考试时间即将到来，致使距离省城杭州较近的某些州县，在收到通知后未及时向各考生通报考试将近消息，一些边远州县甚至未曾收到通知，让很多有资格者没能被“报送”，以致于未参加此次考优。<sup>⑤</sup>《时报》因此直接指责支恒荣幕府玩忽职守：“浙江新考优贡，提学使署中办事疏忽，致外间人言藉藉。”<sup>⑥</sup>

具体到考优的考生资格要求，据《南方报》、《新闻报》所报道的支恒荣所订考试章程可知，其依据的是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礼部《各省保举优生量加推广》一折，折中言及将各省优生名额“照定额酌加四倍”，但“已入学堂及现在出洋游学各生”“不得与考”。<sup>⑦</sup>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此章程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不少学堂学生和留学生对之置若罔闻，某些学堂居然停课让教师和学生一起参加考优，台州各属有六所学堂，“其全体师生仍一律照常上课者，惟太平中学堂一所耳。”<sup>⑧</sup>凡此可见考优之举对于学堂和学生的影响之大。

① 《读贵报载浙江支学司上张抚条陈学务书后》，《时报》1907年2月21日，第1页。

② 《准举选派省视学》，《时报》1907年2月26日，第3页。

③ 参见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④ 《奏请添给提学司俸银》，《新闻报》1906年12月29日，第2张。

⑤ 《考优向隅》，《新闻报》1907年1月12日，第2张。

⑥ 《论浙提学使考优事》，《时报》1907年1月19日，第1页。

⑦ 《浙提学使传考优生》，《南方报》1906年12月15日，第2页新闻。另可参见《浙省提学使飭各属文》，《新闻报》1906年12月12日，第2张。

⑧ 《学堂教习竟停课考优》，《南方报》1907年1月9日，第2页新闻。

至于此次优贡考试的应试人数，时论有多达一千五六百人的说法。<sup>①</sup>这很可能是报名参加“报送”者，而非到场参加考优的人数。参加这次浙省丙午考优的士子数额当为900余人，1907年1月10日开考，“首题为政不在多言论。”<sup>②</sup>1月14日，由支恒荣主导的此次考试初试结果公布，共取200人。1月15日复试，1月18日公布复试结果，然后支将中选考生（正取30名，陪取30名，包括黄岩许元颖、平阳陈京、温州留日学生汤国琛等在内）的试卷“一并申送”浙江巡抚，由其在1月21日亲自面试60位入选者，再决定最终的录取名单等第。<sup>③</sup>稍后，30名优生的正式录取结果公布。<sup>④</sup>

有关此次优生考试的录取内幕，内中颇多曲折。张桐的日记中载有亲历者的现身说法，虽未必完全真确，但可供我们管窥支恒荣作为及其所采取的新旧调和策略情况，亦可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这次考试对于部分浙江士子的意义所在：

午饭后，新科优贡陈君京来到四房六婢处拜客……予询以旧冬初试事。陈君云，支提学使首场延苏省东洋留学生王某阅卷，颇喜新颖，至次场题为“欲治其国者”一节，则专讲理法，尚新学者一概不取。且临场点名时，支提学使相其貌而定暗号……以貌取人，不论文字，亦考试中一创局也。而复试则由张中丞亲考，每名局试搜检，片纸不携，遂至正贡三十人中，被黜者八人，陪贡三十人被选者八人。平阳汤君联奎（但《新闻报》上公布的正取、陪取名单均没有此人，或系其在初试录取名单中——引者注）已在正贡之中，电信带家，庆贺开宴，热闹非常。忽因复被黜，并不得应法政之试，可谓抱屈极矣，宜其留杭度岁，而不肯归也。<sup>⑤</sup>

按照惯例，学使确定优贡考生录取人选后，地方督抚一般会加以尊重，不再做大的变更。但这次考优录取，浙江巡抚张曾敫从陪取名单中竟然录取了8人，大不同于支恒荣原初的录取名单。这样的更改显违惯例，实际反映了支恒荣所拟的录取名单争议太大，以致张曾敫不得不出手干预。一如后来媒体的报道：

浙省向例优拔由学使选取后送请抚院会考，从无更动者。自丙午优试起，提学改归抚院节制，其时张小帅以支学司所取颇多物议，遂秉公评校，从备取升入正取者甚多，名次为之大动。<sup>⑥</sup>

有关此次考优的考生花费情况，《中外日报》有详细叙述，指出提学司衙门各书办皆系留用的“学政旧吏”，这些人“公同集议”，制订了对浙省参与优贡考试者的收费标准。统计各种费用，杭州“本城考生每名须预缴洋十四元八角，方能入场应试。外府考生，尚须加倍取资，以符旧例云”。<sup>⑦</sup>这样的收费虽属照旧例操作，但收费名目繁多，费用委实不低，对于报名参加此次优贡考试的士子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有时论认为支恒荣及提学司诸书吏有藉操办考试

① 《谕令优生报考法政》，《时报》1907年1月19日，第3页。

② 《浙提学开考优生》，《申报》1907年1月16日，第2张第9版。

③ 《考优续志》，《新闻报》1907年1月20日，第2张；《浙江优试录取名单》，《新闻报》1907年1月21日，第2张。

④ 《浙省考优揭晓》，《申报》1907年2月3日，第2张第9版。

⑤ 张桐：《杜隐园日记》，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七日，温州图书馆编：《温州市图书馆馆藏日记稿抄本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990—7991页。

⑥ 《浙江复试拔优两场之严厉》，《广益丛报》第7年第20期，宣统元年七月初十日，“纪闻”，第6页。

⑦ 《杂事汇录·杭州·集议考优各费》，《中外日报》1907年1月2日，第7版。

自肥的嫌疑,“以取士之典,为徒隶索贿之门”。<sup>①</sup>同时又造成了科举风气的复盛,“由是科举世界又突见于煌煌上谕停止科举专办学堂之提学司衙门。”<sup>②</sup>《中外日报》上的另外一篇评论则认为,负责考试的官员和胥吏藉考试渔利是常态,甚至为此不惜“败坏全省之学务”,这也提醒我们清末有些官员不愿意废科举、废科举后仍希望恢复科举,其背后或不乏利益动因:“学使所重视者为考试,考试可以收取规费,需索供张。其蔑视官箴者,更出售前茅数名,博取黄白米,以补廉俸之不足。”在这篇评论看来,支恒荣上任后亟亟于考试,其目的即在此,故此才汲汲于安排举办各种考试,“(支恒荣)自十月间履新后,十一月考优,十二月考职,明年正月又须科举贡也。”<sup>③</sup>

对于浙江考优、考职的高收费以及学堂学生不顾禁令参加考试的情况,曾有人投书《时报》,对支恒荣及诸胥吏忽略禁令、借考优赚钱牟利的做法表示不满,也对诸多学生违禁考优感到“不可思议”。<sup>④</sup>该投书结尾还指出一考优试题“大有语病”,<sup>⑤</sup>讥笑支恒荣幕中无人。

《新闻报》稍后也对此次浙江优贡考试发表了“论说”,目之为“不科举之科举”,认为中科举之毒者与中鸦片之毒者类似。可惜很多人包括留学生在内依然甘中科举之毒,致使参与考优人数远超昔日科举时代之考优人数:

然则科举废矣,而不科举之科举转较科举时代为盛。他姑不论,即如近日浙省考优,竟有一千五百余人之多,此前之所未闻也。最奇者,高张学堂灯笼以接考者,独居与考者之多数。是科举一门,向为旧学家之宝物,而今复为号为新学者所掺夺也……而新学家乘此时机,有两方面之出身,可谓便利极矣。此岂权利竞争之发达乎?科举之气运可谓长矣,科举之思想又复活矣!<sup>⑥</sup>

进而,该评论批评提学司衙门未能有效进行甄别,让许多没有资格参加考优的学生与教员也蒙混进来。之所以如此,该评论分析道,乃是由于提学司衙门的书吏贪图考试报名费,故滥许考生报考。文末又批评学部办学宗旨不明,办理学堂和留学生事宜均在按照旧时办理科举的方式操作,让不少人仍热衷于获得科考功名,对恢复科举存在幻想。《中外日报》上发表的一封浙江读者来信,则以亲历者的观察批评支恒荣到浙江后急于举行考优等举措造成的恶劣影响,且其任人唯亲、所用非人,给浙省造成的伤害甚大。<sup>⑦</sup>

以上这些报道和评论均出自上海趋新媒体,批评指责之意溢于言表,其对浙省考优内幕、造成后果的揭露和批评或存在夸大与落井下石的一面,有些无视支恒荣昔日的趋新努力及其受学部委派代表清政府执行考优政策的现实,且有意无意地建构了支恒荣的无能和保守形象。由前引张桐日记及时论对考试中所出伊藤博文题目的批评可知,此次考优的试题题目并不算太旧。

① 王锡彤:《抑斋文稿·河朔前尘》,林庆彰主编:《民国文集丛刊》,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第1编第64种,第155页。

② 《浙江提学司之舆论》,《中外日报》1907年1月29日,第8版。

③ 《浙江提学司之舆论》,《中外日报》1907年1月29日,第8版。

④ 《论浙提学使考优事》,《时报》1907年1月19日,第1页。

⑤ 这种试题出错的情况似乎并不罕见。两年多后的1909年11月中上旬,支恒荣甫离任提学使,浙江在巡抚增韞主持下又举行了举贡考试,也出现出错题现象,以致需要重考。但考试结束后考生已经纷纷归家,增韞不得到处发电,让与考者返回重考,结果大多数考生因未收到通知而缺考。参见《浙省考试举贡情形》,《时报》1909年11月11日,第3页;《浙省要电汇录》,《时报》1909年12月1日,第3页;《杭州通信》,《时报》1909年12月3日,第3页。

⑥ 《论科举复盛》,《新闻报》1907年1月24日,第1张。

⑦ 《浙江学司之幕友》,《中外日报》1907年3月2日,第3张第2版。



况且最初报道浙省考优情况及支恒荣任职后作为的《时报》、《新闻报》、《南方报》等上海趋新媒体，大都对其持肯定态度，只是后来在与考优相关的负面内容相继曝光与发酵后，这些媒体才改变立场，开始批评支恒荣的做法。

事实上，由于科举甫废，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中央顶层机构学部方设，各地出现兴办学堂热潮，很多人对废科举后清廷续行的考优、考职等考试持漠视或观望态度，报考热情不高。<sup>①</sup> 尽管其录取名额增加四倍，但参加丙午浙江考优的士子远少于稍早时参加丙午直隶考优的 2400 余人，<sup>②</sup> 更远逊于两年多后参加浙江己酉优拔考的 5000 人，与科举未废前参加浙江乡试的万余名考生人数差距尤大。<sup>③</sup> 不独浙江如此，其他一些省份的情况亦大致类似。像福建丙午考优在即，赴省报考者“尚不满百人”。<sup>④</sup> 署理闽浙总督崇善不得不“展限考期，以广招徕”，饶是如此，最后的应考人数也仅有千余人。<sup>⑤</sup>

因之，此次丙午考优造成的影响远不能与昔日的乡试相提并论，只是趋新媒体有意将丙午考优同科举复辟联系起来加以发挥引申，将续行的优贡考试当作学堂和新教育的对立物、守旧与顽固的象征，并有意无意地渲染了时人参与优贡考的热情。像《杭州白话报》上的一篇评论所言：“各生员于停科举后垂头丧气者，至此将吐气扬眉矣！虽然，一省一二万之生员，得者仅百数人，而失之者实繁有徒也。”<sup>⑥</sup>《中外日报》则发表评论批评士子有官瘾，迷恋科举考试这种抡才形式，而继续进行优贡、举贡等考试系科举复辟的表现，学部和提学使助纣为虐，这样的做法对新式教育造成的伤害极大：

官瘾之发现以科举为始……前者中国设立学部，简派提学使，吾始以为教育之普及，必大有可望矣。然静观教育界，凡一省之教育会，必推某状元、某翰林或某学使为正副会长焉。凡一学校之中，其为监督校长者，亦必为某太史、某道员，下而为某孝廉焉。教育为重耶？科举为重耶？再观夫留学界，三年毕业，一纸考凭，得意洋洋而归，运动朝考，运动殿试，或赐进士焉，或赐举人焉，政府以此荣留学生，社会亦以此荣留学生，教育为重耶？科举为重耶？再观之各省新任诸提学使，莅任以后，果认真调查学务乎？未也！果尽力推广教育乎？未也！其所最亟亟者何在？曰考优，曰考举贡……考优、考举贡，则托词于疏通寒儒，其名甚美，悬至少之额，以供多人之求，其利甚厚。高名厚利，谁不愿为？此吾所以急急于考试也。据斯以谈，则学部之派提学使，非令其推广教育，乃使其破坏教育也。提学使之尽力办考优，亦非欲改良教育，乃欲恢复科举也……<sup>⑦</sup>

① 像朱峙三即曾乐观期待：“科举停止以后，举贡生员已定考职出路。朝廷变法图强，逆料将来读书人，除求高深学问无上进。”（胡香生辑录：《朱峙三日记》，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十八日，第 180 页）

② 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年，第 138 页。

③ 关于清代浙江参加乡试的士子数量，康熙四十一年（1702），浙江巡抚曾奏称浙江与考者“每科不下万二千人”。到清朝中叶以后，随着人口数量剧增，与考人员当亦有相应增加，唯太平天国之役影响浙江尤大，导致浙江人口大为减少，则之后应试者数量亦当有所减少。如《申报》曾报道同治末年“浙江应试士子，每科约有万余千人”，该年（1875）仅有九千余人，则清末时数量亦当与此相差无几。参见浙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通志》卷 142《选举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3899 页；《浙江乡试杂闻》，《申报》1875 年 9 月 17 日，第 2 页。

④ 《考优在即》，《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06 年 6 月 24 日，第 6 版。

⑤ 《优贡考期》，《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06 年 8 月 5 日，第 4 版。

⑥ 杜述武：《对于生员考优拔考巡典之政见》，《杭州白话报》1907 年 1 月 16 日，原报未注明版面。

⑦ 《论考优之影响于教育》，《中外日报》1907 年 3 月 18 日，第 1 张第 1 版。

还有论者“芳”（应系常州人沈同芳）质疑清廷于废除科举后重又推行考优、考职、保送举贡等举措，并非意味着清廷是真心“为疏通旧学、体恤寒畯起见”，目的是藉此转移时人注意力、消弭革命：“盖以近数年来，革命风潮，簸荡亚陆，姑留此乡会试之变相，以柔其桀骜不驯之气。”<sup>①</sup>更有论者直斥清廷续行无多大意义的优贡、举贡考试，是“以此计欺罔”士子，“未免不仁”，让众多士子“徒以服从功令，沉迷于一得一失之间而不知自拔，以致学无实际，莫补时艰”，形同“见乞丐而施钱米，不为之谋职业，俾其终为乞丐，而社会亦终蒙其害”。<sup>②</sup>

这些出自时论的批评虽有苛责、愤激成分，但并非无的放矢、蓄意贬斥。由以上浙省考优情况可以清楚发现，清廷废科举续行优贡等考试，的确是纵容乃至鼓励了旧有的科名思想与官本位崇拜，使得一些本来对科举不再抱有希望、不得不入新式学堂读书的人重新燃起希望。如孙诒让所言：“因此误窥朝旨，谓科举仍当复行，学校不过暂设。”<sup>③</sup>由是，继续考试优拔等举措才会被很多趋新时论认为系拉倒车，是“乡会试之变相”，为打算正式规复科举制的前兆或预演。孙诒让稍后更是提出建议，希望学部永远停止优拔贡等各项杂试，强迫推广义务教育，以学堂而非以科举类“杂试”论出身：

伏愿大部申明禁令，一切杂试，奏请永远停罢，全国士民，子弟不入小学者有罚，非毕业中学、大学者，更无出身。庶普天率土，塙然知以求学为标准，举凡调停疏通之意，概从摈绝，俾不得混淆观听。<sup>④</sup>

可惜孙诒让对清政府及学部的期望值过高，优拔等“杂试”终清一代，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在己酉年愈演愈烈。同样，外来的批评也没有危及支恒荣的政治前途，1907年夏，支恒荣仍被列入学部向朝廷推荐的可以担任丞参的14位内外官名单之中。<sup>⑤</sup>

### 三、己酉优拔考试

1908年底，清廷决定次年的己酉优拔等考试正常举办。稍后，经学、礼两部合议，考生的资格限制与优拔等考试时间得以明确。学部遂于宣统元年二月廿二日致电各省，通知该年考试优拔时间及考生的资格限制：

考优拔试期应在暑假内举行，各学堂教员系生员出身者，未经得学堂毕业奖励者，法政讲习科、不满二年之师范简易科，已未毕业学生系生员出身，例得应考者，均准应考。<sup>⑥</sup>从考试时间的设定与考生资格的限制方面，可以看出清廷对于学堂学生和教习与考优拔的政策支持，较之丙午考优时不准学堂学生与考的规定大相径庭，表明清廷这时公开执行了后来为时论所指责的“寓科举于学堂”政策。<sup>⑦</sup>此举对新式学堂造成的影响极大。

依照学部指示，在支恒荣的主持下，己酉年夏秋之交，浙江再次举行了优贡及拔贡等考试。原本学部决议，各直省优拔考试时间均放在暑假初，以方便学生和教员应考。但这个时间与咨

① 芳：《论礼部定期考试举贡》，《申报》1907年6月19日，第1张第2版。

② 杜述武：《对于生员考优拔考巡典之政见》，《杭州白话报》1907年1月16日，原报未注明版面。

③ 孙诒让：《学务本义》，张宪文辑：《孙诒让遗文辑存》，《温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32页。

④ 孙诒让：《学务本义》，张宪文辑：《孙诒让遗文辑存》，《温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32页。

⑤ 《学部奏保丞参》，《大公报》1907年7月21日，第2版。

⑥ 《为考优拔试期应在暑假内举行事自北京致端方等电报（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27—01—002—000198—0135。

⑦ 参见《论寓科举于学堂之非策》，《申报》1910年3月30日，第1张第2、3版。

议局选举日期冲突，为了不影响咨议局选举，继任浙江巡抚增韞参考福建、广东先例，让支恒荣通知考生将优拔职考试推迟半月举行，于己酉年六月十日“取齐”，十五日开考拔场。<sup>①</sup>

支恒荣根据学部、礼部会议后公布的考生资格要求，公布了《浙省考试优拔职简明条例》，对浙江参与优拔职考试考生的资格要求与考试注意事项进行明确和细化，强调只有未获得奖励的学堂学生和廪增附生等才能参加考试，并提醒考生应出具自我身份信息与基层学官的报送证明。<sup>②</sup>

由于考试时尚为暑期，加上优拔同考，考生的资格限制又非常宽松，无形中受到鼓励的浙江各地报考优拔者居然有五千人，远超丙午时的一千五六百人，其中大部分报名者为学堂学生与教员。时论对此有较为夸张的描写：“人数之多，几与从前乡闾相埒，而尤以学界为最踊跃。”<sup>③</sup>此外，其他具有新式身份的军界、警界人士和留日学生，甚至新当选的咨议局议员，“无不争先恐后，踊跃应试。”<sup>④</sup>

即便像浙江余姚考生朱鄂基（即朱鄂生）这样读过不少新学书刊、衣食无忧的官宦子弟，也决定去参加己酉优拔考试。尽管他早已认识到优拔系“末世功名，已同鸡肋”，但依然整顿行李，从余姚坐轮船经上海赴杭州应试。朱鄂基的熟人中也有以新身份报考优拔贡考试者，如曾为高等学堂预备科毕业生的山阴邵骥即参加了优拔考试而获中选拔生，朱鄂基评论此举：“舍高等专科而图此末世吐骂之科名，殊可惜也。”<sup>⑤</sup>

浙江考生参与优拔考试的狂热程度，通过以下两则故事也可管中窥豹。浙江处州有“殴毙人命”久未被抓获的在逃犯，为了参加此次己酉拔贡考试，“竟贿通学官，来省应试选拔”，被原告侦知后，“追踪来杭，呈控学署”，结果该犯被当场拿获。<sup>⑥</sup>还有浙江台州某咨议局议员参加考试后，虽中选却只能被分派以候补“典史”一职，地位远不如有“平议全省兴革事宜，有监督督抚之责”的议员，《大公报》讥其为“求荣反辱”。<sup>⑦</sup>

考生报名者多，提学使衙门收取的卷费数目就大，获利就多，<sup>⑧</sup>这还不包括考生报名时需向地方学官缴纳的“费敬”。当然也有考生不愿按旧例交纳费敬，而是联合起来将交纳费敬额数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浙江台州黄岩参与考优拔诸生的情况即是如此，1906年浙省考优时该地赴考者只有5人，但1909年暑假这次优拔考的与考人数则大为增加，如按照上次成例操作，每名考生需缴纳费敬6元，“未免学中获利太厚”，这些人于是集议，“决定将册费减半，每人三元”。当地广文对此事虽不满，“然出于大众公议，亦无法挽回也。”<sup>⑨</sup>

而一旦考中，考生需要支付的各种名目费用更多。余姚增生朱鄂基考中优生后仅是进场誊卷，领取准予赴京参加朝考的贡单，就支付了9元贡单费，另外还要支付膳费2元、付给硃条员

① 参见《定期改迟考试优拔职》，《大公报》1909年5月28日，第2张。

② 《浙省考试优拔职简明条例》，《浙江教育官报》第9期，宣统元年三月，第57—59页。

③ 《学界不必随同考职之牌示》，《申报》1909年8月20日，第2张第3版。

④ 《杭垣考试优拔之踊跃》，《申报》1909年8月4日，第2张第3版。另可参见《四千八百余名之优拔》，《神州日报》1909年8月6日，第3页。

⑤ 《朱鄂生日记》，己酉六月初八日、十月二十日，赖明德主编：《民国史学丛刊》，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3年，第1编第63种，第486、522页。

⑥ 《提学使缉捕之神妙》，《民呼日报》1909年8月4日，第3页。

⑦ 《议员之求荣反辱》，《大公报》1909年9月11日，第3张。

⑧ 《定期取齐考试优拔》，《舆论时事报》1909年7月31日，第2张第1页。

⑨ 《会议减送考优学费》，《舆论时事报》1909年7月20日，第2张第1页。

1元。<sup>①</sup>这还不包括他需要照例向提学使进献的赞敬,以及支付提学使衙门与基层学官的各种需索费用。如据媒体报道,在参谒支恒荣时,初试中选的二百余名浙江优生和选拔生每人至少要准备数十元赞敬,给门丁仆役的门包等费用尚不包括在内。<sup>②</sup>

由于报名参加考选拔的考生人数太多,原来用作考场的贡院已经改作全浙师范学堂,<sup>③</sup>而“提学署考棚仅容一千八百人”,支恒荣不得不采取分场连续考试的方式。因系分场连续举办,加上复试、面试及等待结果揭晓的时间,此次浙省优拔取考试持续时间达一个多月之久,这还不包括考生旅途往返时间。如时人在日记中所言:“(六月)十五日首场先优贡,续即考试拔贡,后即考试杂职,其中在省亦须月余而已。”<sup>④</sup>

在考拔前,为严肃考场风纪,避免枪替、抄袭、夹带等弊病,支恒荣也做了一些努力。他特意“牌示”诸考生,表示他本人会在考场“当堂面试,核对文理笔迹”,“限四刻钟交卷,除笔墨外不准携带片只字”,为了避免考拔头场中因人数过多导致“点名给卷”出现错误的情况,支恒荣又要求各生在嗣后的考试中务必“身挂卷袋,上面粘贴姓名三大字,每字须二寸大,如卷袋不及措半,即于考具上粘贴”,以便据名领卷,不发生“歧误”。<sup>⑤</sup>

然而,考试正逢盛夏高温,有40多位考生因此患上痧症;<sup>⑥</sup>考试结束后等待考试结果揭晓的过程中,又有瑞安某考生因中暑医治无效死亡。<sup>⑦</sup>更有甚者,温州一考生因落榜而致疾,病殁于上海旅次。<sup>⑧</sup>此次浙省优拔考试中考生遭遇不幸的案例绝不只有媒体中披露的这些。据《张桐日记》载,其堂弟张璞亦在参加优拔考试时“病重生死不测”,“同人代其寄电通知家属”,然其家“清贫如洗”,连付1元电报费都很困难,张桐回忆当年其族叔赶考病逝之事,感叹道:“然当此炎暑,各业皆停工放假,而赫赫然为提学者,反为此不急之科举,致害寒儒性命,参之肉其可食乎?”<sup>⑨</sup>

类似丙午年上海趋新媒体对浙江优贡考试的密切关注,这次浙省优拔考试所受关注程度同样很高,支恒荣的名字和有关考试与录取的弊闻仍不时见诸报端。如考场中有考生为抗热提神而公然吸食鸦片,《民呼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并画图讽刺。<sup>⑩</sup>更严重者,拔贡考试结束后,马上传出有人以500元兜售一选拔生名额的消息,且与买主“订约束券,俨然公平交易”。<sup>⑪</sup>在这次拔贡考试中,浙江还出现京师法政学堂学生回浙考试花钱2800金雇人代考中选,为落选考生联名揭发控告的情况。<sup>⑫</sup>

① 参见《朱鄂生日记》,己酉七月十四日,赖明德主编:《民国史学丛刊》,第1编第63种,第494页。

② 《科场积习难除》,《时报》1909年9月10日,第3页。

③ 《饬知拨定师范额费》,《时报》1907年9月4日,第3页。

④ 周兴祿整理:《黄秉义日记》,己酉五月十四日,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024—1025页。黄秉义此处记载有误,此次浙省是六月十五日先考拔场,之后再考优场。

⑤ 《学署牌示照录》,《舆论时事报》1909年8月11日,第2张第2页。

⑥ 《四千八百余名之优拔》,《神州日报》1909年8月6日,第3页。

⑦ 《热心科举者之可怜》,《民呼日报》1909年7月30日,第3页。

⑧ 《有殉优拔而死者》,《神州日报》1909年8月30日,第4页。

⑨ 张桐:《杜隐园日记》,己酉七月初二日,温州图书馆编:《温州市图书馆馆藏日记稿抄本丛刊》,第8489—8490页。

⑩ 《选拔场公然吃鸦片》,《民呼日报》1909年8月4日,第3页;秋心:《优拔与鸦片》,《民呼日报》1909年8月5日,第3页;《选拔场公然吃鸦片》,《民呼日报》1909年8月7日,图画。

⑪ 《拔贡之价较骤尤廉》,《民呼日报》1909年7月30日,第3页。

⑫ 《攻诘拔贡枪替琐闻》,《申报》1909年8月14日,第2张第2版。

为使浙江巡抚增韞顺利接受自己判定的优生考试录取结果，已从丙午考优录取过程中吸取教训的支恒荣“深恐重蹈覆辙，于面子太下不去”，特意“秘商邻省提学使”，决定不像丙午考优时那样录取多达二百人进入复试，而计划只录取60名。<sup>①</sup>优贡复试时，“形式甚为严整”，支恒荣“躬自巡视”。<sup>②</sup>60位考生参加的复试结束后，支恒荣只公布了正取的30人名单（如丙午考优时一样，学部派给浙省的优生录取名额也是30人），并托人暗地疏通浙江巡抚增韞，希望他能认可这个录取结果。岂知这个自作聪明之举引起了更大的纠纷，据时论所言：“物议更胜于前，各属士子多有不平，而禀院攻讦者日必数起。”<sup>③</sup>支恒荣的录取名单引发的考生攻讦，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有攻讦提学使者、有考生间互相攻讦者、有无理取闹者，大多数均集矢于获雉者与提学使支恒荣，“宗旨所在，非报复即排挤而已，甚有不用正式公文而控告者，亦有攻其人而其人并未与试者。”<sup>④</sup>

在浙省优拔考试结束后接着举行的生员考职中，因其考试资格较之优拔的要求更为宽松，“无论已入学堂、未入学堂之廪增附生、已捐贡监者”均可报考，<sup>⑤</sup>导致报考人数多达7000余人。鉴于此前优贡录取中饱受考生攻讦的教训，加上暑期结束学堂即将开学，支恒荣在正式的优生录取结果公布后督促落榜学生、教员速速返校，不要再去参加意义不大、更加低阶的考职，以防发生更多的诉讼攻讦现象。<sup>⑥</sup>不过诸考生完全不以支恒荣的建议为然，依然留下坚持考职。考职之初，支恒荣颇尽职守，“异常认真，精神尚称矍铄”，并未表现出拔优考试以来连续监考改卷面试的疲累，不料其后老家来电告知“长公子得病而没”的消息，支恒荣大受打击，有了辞职之意，“遂一切不问。”<sup>⑦</sup>

当然，时论对支恒荣的报道也非全部负面，亦有个别肯定性的关注。如《申报》曾报道浙江巡抚增韞认为支恒荣任职以来“实心提倡浙省学务”，成绩突出，特予以表彰和鼓励。<sup>⑧</sup>《神州日报》也曾报道支恒荣按照学部要求，努力改良浙省学务，派省学调查评估“各学堂办理之优劣”，“飭劝学总董实行巡视”，“广颁初等小学章程，及实发教育官报”，以“开通风气，使无阻碍”。<sup>⑨</sup>再如这次浙江考优拔之前，支恒荣鉴于浙省考生人数分布存在地域不平衡，有考生人数少的地方取额多、考生人数多的地方取额少的现象，因此特向学部请示把浙江各府州县的学额给予“变通办理，酌予增减”，但遭到学部“此系成例，万难更改”的批驳。支恒荣的申请虽不成功，却引来时人的赞誉。《时报》对此进行了比较正面的评价：“一片热心，就此取消，凡平日之怀才不遇者闻之，咸称颂不置。”<sup>⑩</sup>支恒荣在己酉优拔考中所录取的个别

① 参见《浙江复试拔优两场之严厉》，《广益丛报》第7年第20期，“纪闻”，第6—7页。

② 《朱鄂生日记》，己酉七月初二日，赖明德主编：《民国史学丛刊》，第1编第63种，第491页。

③ 参见《浙江复试拔优两场之严厉》，《广益丛报》第7年第20期，“纪闻”，第6—7页。当时录取的200名拔贡、30名优贡名单，可参见《浙省选拔案揭晓》，《新闻报》1909年8月12日，第2张；《浙省取定优贡名单》，《新闻报》1909年8月21日，第2张。浙江最终的优拔贡录取名单，还可参见《浙江巡抚增韞奏己酉科考优拔贡姓名折并单》，《政治官报》第739号，己酉十月初四日，第101—104页。

④ 《浙省选拔纪闻》，《新闻报》1909年8月10日，第2张；《杭垣选拔之怪现状》，《申报》1909年8月13日，第2张第4版。

⑤ 《浙省考试优拔职简明条例》，《浙江教育官报》第9期，宣统元年三月，第58页。

⑥ 《学界不必随同考职之牌示》，《申报》1909年8月20日，第2张第3版。

⑦ 《浙省考职纪闻》，《新闻报》1909年8月24日，第2张。

⑧ 《增抚嘉奖支提学提倡学务》，《申报》1909年2月11日，第2张第3版。

⑨ 《浙提学飭改良学务》，《神州日报》1909年3月9日，第3页。

⑩ 《提学使拟变通考额不果》，《时报》1909年8月13日，第3页。

考生，还引来正在对各省考优拔情况大加挞伐的《神州日报》的赞扬，称赞支恒荣尚能识人才，录取的某优生“差强人意”，因该考生的策论文“颇能指斥时势，支提学使选取入彀，亦可谓风尘巨眼矣”。<sup>①</sup>

不管如何，一如昔日学政所起的示范作用，提学使支恒荣的作为对浙江考生的影响也非常大。当考生打探到支恒荣的喜好，知其偏爱旧学（实际亦不排斥西学），曾有做学政时主持科举考试的经验，“所取尤以国文可否定优劣”，<sup>②</sup>故纷纷投其所好。像前引《杭州卖书记》所言，丙午考优时士子在考市购买的多是为应付科举考试的书籍，即便有一些士子购阅比较专门的新学书籍，但其目的是应付考优中的时事策论题。他们中很多人对新学均不甚了了，购书只是供临场抄袭剽窃之用，“新书之无销路，因士子脑中满装支学司守旧，喜欢大卷白折，此销场之所以不广也。”<sup>③</sup>两年多后的己酉优拔考试时，支恒荣出题情况亦类似丙午优贡考试，像他在嘉兴、湖州、宁波、绍兴、严州、衢州、温州七属优贡时所出试题，策论意味就非常明显，且比较简单：“唐置安东都护、元立征东行省论”；“问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之说倡自何时？实行者何国？其中有无流弊策。”<sup>④</sup>负责出题的提学使之爱好、西学素养如此，势必极大影响书商和购书士子。故此，己酉书商在杭州的卖书情况和考生的购阅情况亦类似丙午年，主要还是那些专供考试策论使用的史论类著作和所谓“时务书籍”。尤其是那些具有新式身份的考生，更需要购阅这些书籍揣摩仿效。<sup>⑤</sup>《民呼日报》曾特别刊登图画进行讽刺，指出只有西学程度稍高的考生才会购买《新民丛报》类书刊，其余考生购买的仍是《新策论》、《策府统宗》类科举改为策论后的应试书籍。<sup>⑥</sup>

#### 四、学部评鉴

除在两次考试中饱受趋新媒体抨击之外，支恒荣在浙江提学使任上的其他表现也引起当地士绅的不满。早在1907年4月底，就任职半年的支恒荣与浙江学务公所议长濮紫泉及议绅吴震春、邵章、张美翊、学部咨议官汤寿潜等一千浙江士绅大起冲突。据《申报》报道，两造矛盾起因在于学务公所所提多款学务议案，“函致支提学，请其施行”，支恒荣居然“一概驳覆，而且词意之间嬉笑怒骂，谗虐万状”，“于是议长、议绅以及全城学界俱动公愤”，公推代表向浙江巡抚张曾敫“面告一切，并谓支若怙过不悛，定将支控诸学部”。<sup>⑦</sup>在温州的孙诒让通过上海报纸的报道知道双方冲突，又收到其他三位学务议绅的联名解释函，才了解冲突情况，遂写信进行调解，希望三位议绅能以大局为重，同支恒荣和解，“惟是时事多艰，学务重要，廉、蔺释嫌，实深翘望。”<sup>⑧</sup>最终经多方调解，士绅立场有所软化，让吴震春拟定了议长、议绅办事规约，“俾得各有职守”，经张曾敫批准后发学务公所执行，该规则实质是防止支恒荣对学务公所的随

① 《优拔文亦差强人意》，《神州日报》1909年10月3日，第3页。

② 张桐：《杜隐园日记》，己酉正月十二日，温州图书馆编：《温州市图书馆馆藏日记稿抄本丛刊》，第17册，第8388页。

③ 四明语生：《杭州卖书记》，《时报》1907年3月6日，第5页。

④ 《考试七属优生》，《舆论时事报》1909年8月16日，第2张第1页。

⑤ 参见《民呼日报》1909年7月22日，图画。

⑥ 参见《杭垣之怪现象》，《民呼日报》1909年7月22日，第3页；《民呼日报》1909年7月25日，图画；《考试优拔现形记》，《民呼日报》1909年8月1日，第3页。

⑦ 《学务议绅与学使大冲突》，《申报》1907年5月14日，第1张第4版。

⑧ 《孙诒让与省学务公所议绅函》，谢作拳、陈伟欢编注：《瑞安孙家往来信札集》，第236—237页。

意干涉。<sup>①</sup>但两造矛盾“终难融洽”，稍后，由于学务公所“委员中之不肖者又借端行其媒孽”，致使支恒荣更加漠视公所权力，“于公所一切事宜，只知有官而不知有绅”，且又故意在绅士间制造矛盾，“于绅士所屏弃之诸以颐、姚志乐两人，则颇加赞叹”，文章最后评论支恒荣“其用心益可知矣！”<sup>②</sup>此外，支恒荣所派视学人选也屡有争议，像其选中台州杨镇毅“委充宁绍台省视学”，“诘揭晓后即有台州士绅联名禀控学署，谓杨前名梦莲，系廪生，因案斥革，今得省视学一差，设日后来台视学，台人决不承认云云。”<sup>③</sup>浙江地方士绅与支恒荣持久对抗，迫使支一度做出要辞职的姿态，实则以退为进，测试上峰对其支持力度。《申报》对此也曾有关注报道。<sup>④</sup>最后，支恒荣的辞职动作自然是走过场，他仍获得支持并继续留任。

在清廷宣布筹备立宪力行禁烟之际，支恒荣也曾响应清廷号召，严令禁止下属学务人员吸食鸦片，并颁布章程六条。<sup>⑤</sup>事实上，支恒荣本人即患有鸦片烟瘾，属于“戒烟未净者”。<sup>⑥</sup>所以当媒体发布学部将就提学使三年的任职情况展开甄别的报道后，<sup>⑦</sup>即传出支恒荣、陈曾佑、余堃等提学使任上表现拙劣，很可能被开缺的消息，由是引发各省提学使的紧张。<sup>⑧</sup>为此，《神州日报》特意刊出讽刺画，讥讽各提学使的慌张情况。<sup>⑨</sup>尽管因张之洞生病和去世，学部评鉴提学使的工作最终并未实施，不过支恒荣已率先被媒体列入“履历政绩”为各省提学使中“最劣者”之列，认为他“莅任以后，毫无成绩”，与其他最劣者如署甘肃提学使陈曾佑、署陕西提学使余堃“均有开缺之耗”。<sup>⑩</sup>之后，在销病假归来的学部尚书荣庆主持下，学部又曾打算对各提学使到任后的办学成绩开展评鉴，“通盘调查，详加比较，以便知其可否。”<sup>⑪</sup>

外在压力加上丧子之痛，支恒荣在这次浙江优拔职考试结束后，遂上禀浙江巡抚再次请求辞职。<sup>⑫</sup>对此《大公报》有详细报道，肯定其保存国粹的功绩，也提到其为手下蒙蔽欺瞒事，亦叙及支恒荣在办理优拔等考试中的争议，不无辩护惋惜之意。<sup>⑬</sup>浙江巡抚增韫在程序性挽留之后，于宣统元年九月初十日就向清廷代奏支恒荣“患病恳请开缺”，其中特别说到本就有恙的支恒荣因六月中旬后连续主持优拔职等考试，“殚二十余日之心力，幸获竣事。惟病体加以积劳，

① 《浙省学务公所议定办事规约》，《申报》1907年5月25日，第2张第12版。

② 《杭州学务近闻》，《申报》1907年6月7日，第2张第11版。

③ 《支提学用人之悖谬》，《申报》1907年11月1日，第2张第11版。

④ 《支提学奏请开缺纪闻》，《申报》1908年4月20日，第1张第5版。

⑤ 参见《支提学司严禁学务人员吸烟章程》，《时报》1907年5月1日，第3页；《严禁学界吸食洋烟》，《申报》1907年5月2日，第2张第11版。

⑥ 《官界未来之升降机》，《神州日报》1909年11月8日，第2页。

⑦ 学部简放提学使之初，尚书荣庆即曾上奏朝廷，言及提学使“三年任满，由臣部考验成绩”。参见《遵保直省提学使人员折》，《学部官报》第2期，第20页。

⑧ 《各省提学使之恐慌》，《神州日报》1909年9月24日，第2页。

⑨ 《提学使之恐慌》，《神州日报》1909年9月26日，第3页。

⑩ 《甄别提学使之改期》，《大公报》1909年8月10日，第2张；《甄别提学使将发表》，《舆论时事报》1909年9月24日，第1张第2页；《官界未来之升降机》，《神州日报》1909年11月8日，第2页；《京师近事》，《申报》1909年8月1日，第1张第5版。

⑪ 《甄别提学使之近耗》，《大公报》1909年10月9日，第2张。

⑫ 支恒荣其实很愿意做官发财，据《申报》报道，当浙江巡抚张曾敫因秋瑾案受到舆论压力主动请求调离时，本打算让支恒荣署理浙省布政司这个优缺，给其一个发财和任用私人的机会。支恒荣大喜，结果事情未成，曾大骂张曾敫。参见《支提学不得浙藩之懊丧》，《申报》1907年9月23日，第2张第12版。

⑬ 《学司力求开缺之原因》，《大公报》1909年9月17日，第2张。

精神愈行萎顿”，请假调治后病情反而加剧，“虽勉力支撑，而起立即时觉昏晕，当此振兴学务之时，公事烦难，学司尤甚”，故此力不胜任，请求开缺回籍养病。<sup>①</sup>果然，九月二十四日，朝廷接受了支恒荣辞呈，将浙江提学使职位交由云南人袁嘉穀暂署。<sup>②</sup>袁嘉穀行前接受摄政王载沣召见时，载沣批评支恒荣“因循敷衍”，让“浙省学界，屡酿风潮”，提醒袁就职后，“务须认真整顿，以仰副朝廷兴学育才之意。”<sup>③</sup>而据《大公报》的分析，支恒荣自请开缺其实是迫不得已，朝廷早有意撤换支恒荣，因其“办理学务毫无进步”，虽由“某枢臣”“力为斡旋”，但却不被“认可”，该枢臣“特发秘函授意”支恒荣主动辞职，“以全体面。”<sup>④</sup>非但如此，就连当初推荐任命支恒荣的荣庆也公开表达对支恒荣浙江任职情况的不满，认为其“贻误”浙省学务“甚深”，需要新官去“切实整顿”。<sup>⑤</sup>荣庆表态或有迎合载沣之意，不过由此亦可见支恒荣任职的情况早已令朝廷不满，连荣庆也无法为其转圜，所以支恒荣自求开缺被迅速接受也就不意外了。

不止于此，除了洁身自好的江宁提学使陈伯陶这样极少的例外，<sup>⑥</sup>当时诸多提学使任职情况与支恒荣大同小异，糟糕程度或有过之。像福建提学使姚文倬在丙午考优录取中，买卖优生名额，“尤专以贿赂轻重为黜陟”，录取榜单公布后，引发“诸考生呈控纷纷”。<sup>⑦</sup>江苏提学使樊恭煦在主持苏省己酉优拔考试期间，出现的问题也非常多，<sup>⑧</sup>还被趋新的常熟士人徐兆玮认为“素以仇学为心”。<sup>⑨</sup>署理陕西提学使余堃则专以新学为敌，纵容地方官肆意破坏学堂，不但为时论抨击，还遭到言官弹劾。<sup>⑩</sup>署理江西提学使林开蕃在己酉优拔考试中的表现更是等而下之，其贪污受贿、任人唯亲、钳制舆论，所出优拔考试试题陈旧，并有买卖优拔名额之嫌，情形非常恶劣，引发了御史弹劾。<sup>⑪</sup>然而林用贿赂收买手段，居然渡过风波平安无事。<sup>⑫</sup>同样与支恒荣一起赴日考察过教育的署理甘肃提学使陈曾佑的作为更加不堪，他于优拔等考试中大收贿赂，且鸦片烟瘾极大，还纵容侍妾残害婢女。<sup>⑬</sup>即便是个别热衷于办新学的提学使，其做法也大有可訾议之处。如根据王树枏在新疆的见闻和记载，也赴日本考察过教育的署理新疆提学使杜彤到任后，不顾地方现实情况和财政能力，模仿内地，广建学堂，且不准别人反对，但其意并非在兴学，而是借此“虚额报部”，获取升官发财机会，并大肆“索地方纳费”，导致

① 参见增辑：《奏为提学使支恒荣患病难以速痊请开缺回籍调理并请迅赐简放事（宣统元年九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04—01—12—0679—029。

② 参见《上谕》，《申报》1909年11月7日，第1张第2版。

③ 参见《新简浙提学召见述闻》，《申报》1909年11月16日，第1张第4版。

④ 《李岷琛、支恒荣开缺之故》，《大公报》1909年11月10日，第2张。

⑤ 《调查浙省学务》，《大公报》1909年11月15日，第1张。

⑥ 参见《最近之陈学使》，《神州日报》1909年10月15日，第3页。

⑦ 《福建优贡之大冲突》，《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06年9月16日，第1版。

⑧ 参见《考优拔片片》，《申报》1909年7月25日，第2张第4版；《暑假期内之优拔记》，《旅客》第2册第32期，宣统元年七月十三日，第12—14页；等等。

⑨ 《徐兆玮日记》，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记（1909年6月9日），李向东等标点，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983页。

⑩ 《陕西提学使被参》，《申报》1909年1月16日，第1张第4版。

⑪ 《林开蕃被弹述闻》，《神州日报》1909年9月12日，第2页。

⑫ 《江西提学使近事汇录》，《民吁日报》1909年10月4日，第4页。

⑬ 《腐败不堪之学使》，《申报》1910年4月14日，第1张后幅第4版。



“官民同受其害”。<sup>①</sup> 即便王树枬上书学部“痛切”揭发杜彤，学部依然“置之不问”。<sup>②</sup>

简言之，较之姚、樊、余、林、陈、杜等提学使的所作所为，任命伊始就引发争议的支恒荣在浙江提学使任上的表现难说为最糟糕。其主要问题或正像前引《大公报》评论所言，是“不善新政”，兴学不力、所用非人，其表现或不应被列入“其下者”，也像蒋维乔指出的那样：

二十余省中之提学，问有能尽力提倡，使一省教育蒸蒸日上者乎？殆无有也。其上者，于教育事业不加反对、略与抚助，已觉不可多得；其次者，循例敷衍，但求无事；其下者，则顽固陋劣，对于教育界尽吾力以摧折之而已。<sup>③</sup>

即便各提学使之表现如此、受到的批评如此，被媒体寄予很高期望的学部“甄别”提学使工作也仅仅是宣传而已，荣庆任上根本就未付诸实施。如时论之言：“各省提学使甄别问题，早经提议，惟迟之日久，未见施行”。直到唐景崇继荣庆任学部尚书后，才又重提对提学使加以甄别一事，但甄别对象仅限于在任五年者。<sup>④</sup> 只是能任满五年的提学使为数极少，唐景崇的这一动作涉及目标极为有限，其实施效果同样值得商榷。

实际上，包括饱受趋新媒体指责的余堃等在内的各提学使在任职期间多四平八稳，并未因学部甄别、御史弹劾或受到舆论抨击而被“开缺”。一如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新任学部尚书唐景崇在请清廷实授署陕西提学使余堃、署新疆提学使杜彤的奏折中所言，两人在困难条件下依然大力兴学，取得不俗成果，应该加以奖励，改授实缺。<sup>⑤</sup> 有被时论称为“张南皮第二”、“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学部尚书这样的考核评价，<sup>⑥</sup> 余堃和杜彤的署理职务自然会被清廷实授，之后余堃的谢恩折也表明清廷采纳了唐景崇的建议。<sup>⑦</sup> 个别媒体原本希望看到各提学使在学部评鉴中出丑的期待，<sup>⑧</sup> 无形中已然落空。

凡此种种，均可见作为“主持全国教育行政最高之机关”的学部，在清末教育和文化事业中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是它制订的条条框框太多、无端的干预太多、私谊优先的考虑太多，另一方面它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又面临来自各方的掣肘，缺乏有效应对，游走于趋新守旧之间，经常粉饰敷衍、因循守旧、得过且过，造成的结果是进退失据、左支右绌，最终导致其权威性、合法性迅速丧失，沦为朝野上下的众矢之的。而面对愈加趋新激进的社会氛围和舆情，学部变得更加保守，随意干涉新式教育，“仍蹈科举时代拘墟之习。”<sup>⑨</sup> 以致于有留美学生竟有主张废除

① 王树枬：《陶庵老人随年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1页。关于杜彤在新疆办学的情况与效果，还可参见王启明：《清末新疆学堂教育行政机构研究》，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02—210页。但王文并未注意到该处所引王树枬的叙述。

② 王树枬：《陶庵老人随年录》，第71页。

③ 蒋维乔：《论宣统二年之教育》，《教育杂志》第3年第1期，宣统三年正月初十日，“言论”，第2页。

④ 《各提学使满五年者听之》，《天铎报》1910年4月20日，第2版。

⑤ 唐景崇：《奏为署陕西提学使余堃、署新疆提学使杜彤三年任满照章考核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03—7572—106。

⑥ 《张南皮第二》，《天铎报》1910年4月22日，第2版。另可参见《学部中新旧杂货店》，《天铎报》1911年6月9日，第3版。

⑦ 余堃：《奏为奉旨补授陕西提学使谢恩等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03—7450—094。

⑧ 如《申报》即是如此：“考试优拔之事方终，而考试提学使之信息忽至……此时之提学使，恐不但不如考试优拔之堂皇，且不能如新得优拔诸君之兴会也。急哉提学使！伤哉提学使！”（《提学使之恐慌》，《申报》1909年8月26日，第2张第4版）

⑨ 《学界中又来一魔鬼》，《天铎报》1911年6月27日，第3版。另可参见《五光十色之学部》，《天铎报》1911年8月16日，第3版。

学部之说,受到影响的杜亚泉也认为学部应该自我约束,不做“万能之政府”,对教育宜采取“放任”态度,裁减行政经费,增加教育经费,打破“以官厅为学术之中心,以官吏为学者之表率”的局面。<sup>①</sup>

## 结 语

通过上述对浙江两次考试及提学使支恒荣任职、学部作为等情况的大概描述,我们不难理解科举废除之后提学使的作为和踵续的考试优拔制度之重要。既有这样的人选操办与政策支持,加之长期科举文化和官本位崇拜的潜在影响,时人对于科举功名的“路径依赖”和迷信遂转向优拔职等考试,于是丙午年尚不太被考生重视的优贡考试、考职等的吸引力在己酉年得到充分释放。各种年龄的士子与各种新式身份的人尤其是学堂学生、教员纷纷下场参加优拔等考试,“苟其无径可寻,斯亦已耳。一旦示以阶梯,诱以所欲,则即以无甚重轻之优拔贡,且不惜奔走喘汗,以侥幸一得为荣。”<sup>②</sup>于此,优拔等考试之于考生乃至时人的意义,提学使本人言行、学部策略对于一省、一国学风与士风的影响和引导,恰似昔日科举未废时代。更重要的是,一如科举未废前的乡会试考试,让各方看重的优拔等考试这时同样变为一种仪式政治(politics of ritual)和嘉年华,考生能够参与其中即获得了读书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对自己能够有机会做官发财或“致君尧舜上”的想象与期待。即便考试失利,考生也通过参与考试获得了赴省城开眼界、见世面、广交游的良机。

面对考生的与考热情,当时的趋新媒体立场基本一致,即对此类考优拔热基本持反对与讽刺态度,然而极少会有考生在舆论的批评声中望考却步。像参加己酉安徽考拔的詹鸣铎称:“是年上海报纸,反对科举,将我们骂得半文不值。且一班老学究,身穿老古套的熟罗折衫,这种古装委实不合时宜,适足添报馆笑话资料,我也置之度外,仍旧赶我的考。”<sup>③</sup>而一旦考中,考生往往会大肆庆祝和炫耀。恰如时论所谓:“笑骂由人笑骂,优拔我自得之。”<sup>④</sup>

媒体骂归骂,考生考归考,这种情形其实也颇能体现出趋新媒体自身的尴尬。尽管不断在批评优拔等考试系科举余毒,但各报刊(如《时报》、《申报》、《新闻报》、《盛京时报》、《大公报》、《神州日报》、《顺天时报》、《天铎报》、《舆论时事报》等)又何尝不是在利用优拔考的机会来构建与展现自己的影响力,犹如科举未停废时媒体喜欢报道乡会试、殿试的情况一样。这时它们除了刊载一些批评性的议论、揭发性的报道外,同样乐意大量报道或引用、转载优拔初试录取和复试录取的详细名单、人数、考中者身份信息,乃至有关朝考的情况、录取内幕、各种小道消息等,其中既有相关主事者如提学使、地方督抚、学部、礼部的表现,也有与考者的各种反应,还有优拔考的试题与答题情形等,诸如此类。正可谓批评者也是推波助澜者。正是由于诸多趋新媒体的广泛参与与深度报道,极大塑造和传播了优拔考试的作用及意义,不但激发了时人关注 and 参与优拔考试的热情,也确定了优拔考试“不科举之科举”的定位,这使得该考试看起来成为一个全社会皆在关心的大事,无形中大大提升了其吸引力和影响力。

① 杜亚泉:《论今日之教育行政》,《东方杂志》第8卷第8号(1911年4月23日),第18页。参见罗志田:《代序》,周月峰编,杜亚泉等著:《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12页。

② 《论社会心理上之病根》,《新闻报》1909年7月30日,第1张。

③ 参见詹鸣铎:《我之小史》,王振忠、朱红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34页。

④ 借:《代新科优拔致上海报界书》,《新闻报》1909年8月8日,第2张。

转言之，优拔考之所以饱受时论批评，陷入“不科举之科举”这样的制度性困境，还因其继承和延续了昔日科举考试中的风气、陋习，并重新激发了时人特别是新学界中人对于科举功名的渴望，于是导致本来系补充性的优拔举贡职考试大有市场，人们的功名意识经由这些考试得到进一步强化，“今科举之名则罢矣，而其实固未罢也。社会之心理，犹受科举之余毒所传染，而不能自疗。”<sup>①</sup>

最后，就本研究的意义来说，过去绝大多数科举史研究者的关注点，集中于科举停废前的情况及停废后产生的所谓断裂性社会影响，而对清廷立停科举后采取的优拔等考试造成的制度性困境、学部和提学使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却极少加以注意。废科举后清廷采取的延续性举措——优拔贡考试、生员考职、保送举贡等——如袁世凯等七人于1905年的联衔会奏中规划的那样，的确取代了被废除的乡会试：“乡试虽停，而生员可以得优拔贡；会试虽停，而举贡可以考官职。”<sup>②</sup> 因此，今天我们讨论废除科举制的社会效果与后续影响，非常有必要从制度史与社会史结合的层面，将优拔考试等清廷采取的后续补救措施所起的作用考虑在内，并注意从历史记忆塑造的角度，结合其时与考优拔诸人的言行、学部和提学使的具体作为，来重新检视传媒、当事者及清亡后时人的反思乃至后世的研究，再现和重构清末科举停废一事中存在的差异与盲区。

附识：本文曾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忠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和曹南屏、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张凯、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杨齐福、复旦大学古籍所金菊园等师友提供意见和资料，尤其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韩策博士的屡屡指教、帮助，复蒙《历史研究》两位匿名审查人教正、提醒，笔者受益匪浅，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路育松）

① 心僧：《呜呼！科举之余毒》，《天铎报》1910年4月26日，第1版。

②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统考》卷87《选举考四》，第8456页。

learning, forming a close-knit group of scholars. Their study of statecraft, rooted in systematic practice of Neo-Confucian ethics, aimed to set up a model of moral exhortation and governance based on Zhu Xi's teachings which would progress from ethical cultivation to practical learning and thence to action in the real world. Again, adopting a moderate and pragmatic approach to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they admired Wang Yangming's accomplishments in practice but also reevaluated his intellectual legacy. This approach also affected their compilation of the writings of Qing orthodoxy; their criteria for inclusion or exclusion included the practice of moral integrity and meritorious conduct, with a view to building a diversified intellectual lineage composed of many streams. As the power of interpreting orthodoxy shifted to the emperor, the space for bureaucrats to correct the ruler's ideas was shrinking. The case of Yin Jiaquan's memorial on sacrifices to his deceased father represented a clash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Neo-Confucianism tradition, a clash that the Qianlong Emperor used to reaffirm his image as the ultimate authority in judgements of facts and values. The Neo-Confucian bureaucrats sought to help the emperor become greater ruler, but under imperial pressure the way they followed could rise no higher than seeking to instill morality among the people.

**An *Keju* (科举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Disguise: Zhi Hengrong and the Zhejiang *Youba* (优拔 Selection of Excellence) Exami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Zhongmin (63)

The Qing court abolish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科举) in 1905 but kept the *youba* (优拔) examination as a remedial measure. In 1906 and 1909, two *yougong* (优贡) examinations were held in Zhejiang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tixueshi* (official of educational affairs), Zhi Hengrong. The two examinations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new-type" young men, the serious disadvantages of which sparked a great controversy, inviting the criticism of reviving the *keju* and other comments. In fact, the alternative *youba* was considered to be a *keju* in disguise; it reinforced the thirst for office and *keju* worship. So when discussing the social outcomes and subsequent effects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old examinations,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for us to combin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histor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ole of subsequent remedial measures including the *youba* examination. We should pay heed to the shaping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words and acts of those who sat for the *youba* examination and the specific actions of the *Xuebu*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tixueshi*, and reexamine the reflections of the new media, the parties involved, and their post-1911 contemporaries. We should even look at the differences and blind spots in later research on the repro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late Qing.

**Chiang Kai-Shek's Dispute with the Guangxi Clique over the Southward Retreat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Strategic Pursuit** Zhang Hao (82)

In 1949, Chiang Kai-Shek and the Guangxi clique clashed over their defeated forces' southward retreat. Chiang planned to retreat to Taiwan, while the Guangxi clique was attempting to retreat to Guangdong and take over Guangdong and Guangxi, or, if this was unsuccessful, to hold out on Hainan Island. Their strategic direction was to defend the borders of Hunan, Guangxi and Guangdong and fight a decisive battle in the south of Hunan. They therefore asked Chiang Kai-Shek to facilitate their move into Guangdong by shifting the troops under his direct command to take part in the fighting. However, Chiang prevented them from entering Guangdong by strengthening his forces in Guangzhou. Bai Chongxi's group then planned to take over Yunnan through troop movements in Yunnan and Guizhou and wait there for an opportunity to withdraw into Burma or Vietnam. However, this plan was again foiled, as Chiang deployed his